

朱德年譜

新編本

一八八六——一九七六（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編

朱
集
行
詩
卷
之
一

朱子詩集卷之二

朱德年譜

新編本

一八八六——一九七六（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編

主审 金沖及

主編 吳殿堯 副主編 庾平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德年谱 (新编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吴殿尧主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1
ISBN 7-5073-2208-4

I. 朱… II. ①中… ②吴… III. 朱德 (1886~1976)
一年谱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8027 号

朱德年谱 (新编本) (1886—1976)

编 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 编/吴殿尧

副 主 编/庹 平

责任编辑/边彦军 王春明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680×960mm 16 开 126.25 印张 1470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073-2208-4 定价：200.00 元（上中下）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1937 年	(647)
1938 年	(729)
1939 年	(851)
1940 年	(930)
1941 年	(1027)
1942 年	(1090)
1943 年	(1122)
1944 年	(1151)
1945 年	(1180)
1946 年	(1221)
1947 年	(1247)
1948 年	(1291)
1949 年	(1322)

1937年 五十一岁

7月7日 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今北京）西南郊的卢沟桥发动进攻，驻守该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军在卢沟桥的这一挑战行动，“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

△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同日，又致电驻守平津一带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1]、张自忠^[2]、刘汝明^[3]、冯治安^[4]等，请他们“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并表示：“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1日 毛泽东、朱德致电在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电告周恩

[1] 宋哲元，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2] 张自忠，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

[3] 刘汝明，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一四三师师长。

[4] 冯治安，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

来转告林伯渠^[1]向蒋介石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编一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再去。请即令二十八军、三十二军两部加强训练准备。

7月13日 毛泽东、朱德致电李仙洲^[2]、高桂滋^[3]：“两兄所部奉命开赴前线，保卫国土，义薄云天。”代表红军向该师将士热烈致敬，表示愿与之“亲密合作，一致抗日”。

7月14日 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等，发布关于红军在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

△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要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

△ 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题词：“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4]，复图占外蒙^[5]，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本（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

[1] 林伯渠，时为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

[2] 李仙洲，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3] 高桂滋，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驻军绥德。

[4] 东三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

[5] 外蒙，指现在的蒙古国，原是中国的一部分，称外蒙古。1921年宣布独立，1946年1月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蒙古独立。

天职！”

7月15日 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向国民党中央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示：“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宣言还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

△ 撰写《实行对日抗战》一文。文章从经济、军事方面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的无法克服的弱点，指出“日本并不是那样可怕的”，让步、妥协与退却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是亡国灭种的饮鸩止渴的自杀政策。抗战，只有在抗战中找出路，求生存，不能踌躇，也不容徘徊，这是每个中国同胞应有的决心！并强调指出：“只要我们全国民众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团结一切力量，动员一切力量，武装一切力量”，“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放弃十年来有着光荣声誉‘红军’这个名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文章于七月二十六日在《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发表。

7月16日 关于红军准备参战及编制原则问题，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叶剑英、刘伯承、张浩，指出：在国民党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而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必要与许可时，得再派一部增加前线”；在国民党政府“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

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

7月17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转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指出：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

△ 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尽快发动全国抗战。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又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7月18日 离开延安，前往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7月23日 抵达云阳镇，与彭德怀、任弼时主持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从南京回来的周恩来、博古也参加会议。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在七月二十四日会议上，讲了卢沟桥事变、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在七月二十六日会议上，指出：在形势转变的情况下，有些干部热情有余，办法不足；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要有一定的纪律；还讲了红军改编后如何使用和补充的意见。在二十七日会议上，讲了如何预防军阀主义的问题。会议于二十七日结束。

7月26日 与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关向应、刘伯承、贺龙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认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所提条件苛刻，“超过我们统一战线的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红军“有瓦解危险”。提出：“我们改编三个国防师一个

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国民党如不同意，“则拒绝谈判，必要时准备将谈判经过公布”。主张“我们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建议“应采取必要准备，在部队中动员吃野菜、筹粮，使全体将士了解争取抗日斗争的艰苦，使全国人民了解红军抗日真诚”。

△ 收到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指出：红军改编后的干部配备问题，待周恩来等回来再商一次才能最后确定。应以加强各师能独立作战为原则。如抗战暂时无望，编制以充实各师为原则。各独立军、师可一齐编入，尽量减少后方经费。将来抗战时留一师在后方。

7月2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朱德、彭德怀等，指出：“中央决定红军和苏区必须全权由我们包办，绝不让步”；“统率机关必须是总指挥部或军部”。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但由于“地方经费，南京必难多发”，“因此多留地方部队成为不可能”，拟改变计划，将所有原独立军、师一概编入三个师中，出动抗日。后方“留一个师，至少留一个旅”。

7月28日 收到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林育英、贺龙、关向应并告叶剑英电，告以：“周、博、林^[1]已回延安。我们商定：（一）立即取得行营^[2]同意，一、四方面（军）及七十四师集中三原迅速改编，以便出动。（二）将各独立军师一概编入，编足四万五千人的三个师。（三）上设总指挥部（将来可让步为军部），朱正彭副，政治部，任正邓副，不管南京承认与否，实行在军委领导下之全权指挥。（四）详由洛

[1] 周、博、林，即周恩来、博古、林伯渠。

[2] 行营，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

周博^[1]明日来前方面告。”

△ 与彭德怀、任弼时致电罗荣桓、邓小平、萧克、宋时轮、宋任穷、贺龙、关向应并报毛泽东：“部队急待出发”，“拟将一、四方面军集中三原、泾阳区域改编”；“第一、第十五军团及第四军、三十一军，统限于本月三十一日由现驻地出发，于八月八日前到达三原、泾阳地带集中完毕”。“二方面军集中庄里，二十八军暂留原地待命”。当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同意朱、彭、任意见，一、四两方面军，均调三原集中改编。”

7月29日 与彭德怀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大战已起，深信委员长必能麾动大军，继续北上，保我华北，复我失地。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谨乞颁钧命，开赴前线，是为至祷。”

△ 日军侵占北平。

7月30日 关于成立中央军委军事研究委员会问题，致电各兵团首长，告以：中央军委组织军事研究委员会，已于六月十二日成立。目的在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对日抗战、目前军事教育、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各项问题，并拟具体意见，提交执行机关。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下设秘书处及编译委员会，编译两委员会各设主任一人，并各指定若干人参加之。委员为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主任朱德，编委会主任李德，译委会主任伍修权。各兵团首长应立即组织各该兵团军事研究委员会，并与中央军事研究会发生密切联系。

△ 与彭德怀、任弼时、聂荣臻、刘伯承、张浩致电中共

[1] 洛周博，即张闻天、周恩来、博古。

中央书记处、军委并告叶剑英：“蒋十七号发表的谈话^[1]虽较前强硬，但未脱离向日求和幻想”，“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南京政府现仍未修正其严重动摇性。我们应以各种方式和行动，来推动蒋介石抗日”。“红军行动和改编仍需自主地动作，并需力求迅速。故我们决定八月一号，一、四方面军向三原、泾阳集中，我们已通知行营^[2]，不管行营同意与否，我们应坚决地这样干，并说我们已经出动”。

△ 收到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林育英电：（一）部队东调必先征得行营同意，否则国民党即认为我们自由行动，必生疑虑，影响抗日大局及两党合作。（二）在行营同意东调后，拟以二十八军驻镇原一带，三十军驻庆阳、白马关一带；陕甘宁独三团驻宁县，独四团驻合水，赤水警卫营驻正宁，二十七军驻云阳、淳化、栒邑。上述接防部队来到前，原驻部队各留一小部驻守防区。

△ 日军侵占天津。

7月31日 鉴于叶剑英从西安的来电中告知，李宗仁^[3]、白崇禧^[4]，刘湘^[5]准备赴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将召开的国防会议，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建议中共也应派人参加会议，争取公开合法地位，

[1] 指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2] 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

[3] 李宗仁，国民党军桂系将领，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4] 白崇禧，国民党军桂系将领，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桂林行营主任。

[5] 刘湘，国民党军川系将领，时任第二预备军司令官兼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

并建议由周恩来、叶剑英出席。

△ 收到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林育英、贺龙、关向应并告叶剑英电：部队可下令从八月五日起开始东移。集中后一面改编一面加紧训练，一面要求南京补充。

8月1日 收到张闻天、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任弼时电：“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

8月4日 根据毛泽东、张闻天八月一日关于红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宜的指示，在云阳总部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等讨论了全国抗战及红军参战的方针问题，并共同将意见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认为对日抗战的方针是：（一）“要求南京要有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和布置”；（二）“争取我们在抗战中参加和领导”；（三）“不反对在推动全国抗战中，须要积极的准备”。“为实现第一项方针，我们要反对妥协调判、增援不力、划地自守与观望或再退的事。作战方针要以分区集团的防御钳制敌人，而反对单守不攻与退却逃跑”。“为实现第二方针我们应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长”；“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补充与使用兵力自由”等。为实现第三个方针，应要求“立开国防会议”、“实行全国动员”等。关于红军出动问题，主张“仍以红军主力出去”，“同时估计到持久战的需耗”，“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不拖延改编”，“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国民党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中共

将领名单全部同时发表，迅速补充发足费用，以便开动；“不发表宣言及全部名单，不补充完备，不能出发”。“关于红军只出三分之一问题，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

△ 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密邀，中共中央决定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共商国防问题。

△ 收到张闻天、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电，关于中共方面在同蒋介石谈判时对国防问题的意见，提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以必要的补充。”“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8月5日 收到张闻天、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伯渠、任弼时关于红军参战等问题的复电，指出：红军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不宜于以“独当一面”之语意提出，而是提“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具体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区（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西进及沿平汉南进之敌，以出击侧面的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并便于派一部

远出热河”。这都是在一定地区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而不是“独当一面”。使用兵力“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其余用以保卫“我们唯一可靠的后方”，因为蒋介石在陕、甘尚有十个师的兵力。

△ 与周恩来、博古致电张闻天、毛泽东，说：关于朱德赴南京同国民党谈判问题，他们虽经反复考虑，但意见不完全一致。朱德认为他目前去南京较以后去有利。同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朱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我们认为朱德同志以即去南京一行为有利。”

8月6日 与周恩来、叶剑英自云阳抵达西安，拟赴南京同国民党谈判。

△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地区，整装待命。

8月8日 与周恩来会见被押解到西安后释放的红军西路军部分被俘人员，表示慰问和鼓励。

8月9日 与周恩来、叶剑英乘飞机抵南京。八月十一日，与周恩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分别发言。朱德说：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钳制了它的大量兵力。并强调抗战开始以后，应当根绝各种和平妥协言行，坚

持持久抗战。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朱德、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8月12日 与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1]、邵力子^[2]、康泽^[3]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康泽提出宣言中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和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朱德、周恩来予以批驳，并要求将中共意见报蒋介石。

△ 收到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电：山西阎锡山已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并称补充须有南京命令即可照办。指出：不反对红军出动主力，但决不可自提出动全部。

8月13日 与周恩来、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和谈判条件问题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告以：“南京主战空气浓厚，主和者不敢公开发表意见”；各方认为“蒋已有抗战初步决心，必须致力于巩固和保证”；“我们已渐取得公开地位，南京各要人及刘^[4]、白^[5]、龙^[6]等均见过”。并建议：（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四）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等。

△ 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第二天，国民政

[1] 张冲，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等职。

[2] 邵力子，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

[3] 康泽，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

[4] 刘，即刘湘。

[5] 白，即白崇禧。

[6] 龙，即龙云，国民党军滇系将领，时任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云南省政府主席。

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称“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8月16日 与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除初步商定红军开赴前方的行动路线外，国民党当局同意每月发给军饷五十万元，另拨开拔费二十万元及一批物资。并告：“朱于本日乘车回陕，叶仍留京进行各种联络及交涉补充款等事宜。”

△ 离开南京去西安。

8月中旬 在南京期间，与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商谈了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十三个地区和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会晤了冯玉祥^[1]、白崇禧、龙云等，商谈合作抗日问题。探望于右任^[2]，商谈中共准备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事，并请于为该报题写报头。

8月17日 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电，关于红军抗日的出动路线问题，指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候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还指出：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3]节制，速通知阎”。

8月1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指出：国共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即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

[1] 冯玉祥，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第三、六战区司令长官。

[2] 于右任，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3] 阎百川，即阎锡山，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